

# 近代福建基督教宣教活动特点

李少明

近代福建基督教的宣教活动具有几大明显特点。

20 世纪初期福建基督教的宣教活动即已基本实现自传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入福建,此后数十年中,先后有十余个西方宣教差会进入福建传教。然而在早期的传教活动中,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以及福建广大民众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痛恨,传教士的布道工作极其困难,倍尝艰辛;外国牧师几望洋兴叹,不得其门而入”。因而,最早入闽的几大差会从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就开始在最初发展起来的信徒中培养福建本地的传道人员,到 19 世纪 60、70 年代,来闽各大差会均相继培养了一定数量的闽籍传道士。此后,福建基督教的宣教活动开始逐渐进入顺利发展阶段,信徒数量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闽籍教牧人员的队伍也相应不断扩大,不仅逐步承担起了福建全省宣教工作的主要任务,而且有些业绩是相当突出的,如 19 世纪 60 年代末,林振珍被美以美会按立为牧师后,即率传道队伍开辟了从闽中到闽南沿海、山区的其范围达到近 10 县的自由布道区。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早由华牧开辟的自由布道区。20 世纪初期福建基督教进入发展高峰时期,闽籍教牧人员进一步大幅度增加。据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统计,1920 年前后,福建基督教的闽籍专职“宣教职员”总数达到 1571 人,而西来“宣教师”(按立职员)仅为 70 人。这两个悬殊巨大的数字显示,最迟到 20 世纪 20 年代,福建全省基督教的宣教任务已基本上由福建本地的宣教职员负责,这也就是说,这时福建基督教至少是基本实现了自传。

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两点是:第一,近代福建基督教主要教派之一的安息日会是在 20 世纪初由厦门人郭子颖从广东传入的,之后虽然安息日会美国总会曾派遣传教士数人来闽协助该教派的工作,但这些传教士的工作内容仅局限在参加主持教会的教务特别是上层区会的教务,该教派不仅其传道为清一色的华人,而且教牧人员中亦无一传教士;第二,真耶稣教会和基督徒聚会处是福建基督教的两大教派,因该二教派均系华人在 20 世纪初期自创的教派,与西方来华宣教组织不存在任何关系,故它们在福建的信徒发展工作更是纯属自传的,从无传教士参与。

## 重视文字布道工作

为促进宣教事业的发展,来闽各西差会和福建地方教会均十分重视文字布道。据不完全统计,自 1858 年福建第一份基督教报纸《福州府差报》创刊,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来闽各差会、福建各级教会组织和基督教青年会先后创办的基督教报刊,其总数在五六十种以上,如果再加上各种教会学校的校报校刊,则达到百种左右。仅在厦门一地,基督教团体创办的宣传基督教的报纸就有《闽南圣会报》(初名《漳泉圣会报》)、《道南报》等 6 种,其中《闽南圣会报》除在闽南地区广泛发行外,还远销台湾和东南亚各地教会。福州的《公道报》是 20 世纪初全国基督教报纸中唯一的日报。美以美会兴化年议会的《奋兴报》不但发行范围广,发行量大,而且因其在宣教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全美国以美会的报刊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重视文字宣教,就连晋江金井基督教会堂这样的基层堂会也创办了基督教月刊

## 特殊的布道方式

《金声》。为使更多的人乐意接受布道宣传,近代福建基督教有些报刊还是免费赠送的,如《福州基督教青年会报》即为赠阅,每期分送全省各地千余份,经费来自代登广告的收入。

大量编写、出版、发行宣传基督教的书籍和通俗读物是福建基督教文字布道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这些布道的文字宣传品种类很多,如神学著作、圣经释义、祈祷书、赞美诗、基督教故事、基督教三字经、布道小册子以及年历、传单等。不但种类多,而且数量也多,如仅美以美会兴化年议会中外教牧人员所编写出版的神学书籍和宣教读物就有 50 余部(册)。许多读物的编写十分通俗易懂,如《基督教三字经》是这样编写的:“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这对于在平民百姓中宣传基督教义,其意义不可低估。这些宣教书籍和通俗读物的发行量很大,1921 年,厦门闽南圣教书会出版的各种教务书籍共 146,967 册,福州闽北圣教书会的出版物合计 61,370 册,兴化美华书局印发出售基督教读物的年销售额达到 1,500 圆(鹰洋)。

近代中国的广大贫苦百姓几乎全为文盲,为使他们能够阅读圣经,一些来闽传教士还想方设法把圣经译成福建的各种方言译本。例如,归正教会传教士养为霖、打马字和罗蛮等人协作创造了“罗马字”(亦称白话字、土白话),将英文字母略加改变,共成 23 个字母,联缀切音,凡厦门方言均可由此拼得且易于学习掌握,不识汉字的人只需要学两三个月的这种“罗马字”就可以读懂圣经等书籍。打马字还为此专门编写了《厦门白话字典》。又如,美部会传教士约翰逊(杨顺)根据福州方言的发音特点,编译了《榕腔圣经》。到民国初年,《圣经》在福建已被译为厦门话(闽南话)、福州话、兴化话(莆田话)、邵武话、建宁话、建阳话、汀州话和客家话 8 种方言译本,在福建各地城乡大量发行,很大程度促进了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

近代福建基督教的布道活动除采取一般的口头和文字宣传以外,还采用了许多特殊的方式。此类特殊的布道方式多种多样,下面兹举较为常见的四种为例:

1、家庭布道。家庭布道是利用家庭主妇在家庭中的特殊身份“引领家庭”,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教活动。在福建,各西来基督教差会和福建地方教会以及差会、教会的附属机构中拥有大量的女职员(包括教牧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据统计,1920 年前后在所有西差会和福建地方教会及其附属机构中,西来女职员占西来职员总数的 70%,福建本地女职员占福建本地职员总数的 33%。这种情况极为有利福建基督教在妇女中传教。各西差会和福建地方教会利用女职员数量特别多的这种优势制定“家庭崇拜计划”,以家庭主妇为对象大力开展“家庭布道”活动。此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不少家庭因此“全家归主”。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福建基督教信徒中家庭妇女所占比重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服务布道。服务布道是一种深入社会生活,将布道工作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寓传教与社会服务之中的布道方式。旧中国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广大民众生活困苦,许多西方来闽的宣教差会和福建地方教会、堂会,一方面根据贫苦民众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如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办班扫盲、科普宣传、妇孺事业、指导科学种田、帮助农村建设以及赈灾济贫等;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些社会服务活动向广大民众宣传基督教道理,宣传上帝之爱。这种紧密结合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开展布道工作的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赢得了众多社会下层百姓对基督教的认同,进而受洗皈依。厦门和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同样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例如,1920 年他们通过开展各种社会服务和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社会知识学习班等,一年中就吸引了

厦门和福州两地共两万多人参加各种基督教活动,其中又有近两千人自愿进一步加入到查经班中学习。福建还有不少城乡教堂通过办托儿所、幼儿园、俱乐室、图书室、游戏场、举办体育赛事、举行故事会、提供农具出借、组织农忙互助和放映幻灯电影等服务市民乡民、活跃文体活动的办法吸引教外群众接近教会,了解基督教,接触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对他们信仰基督教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办法,也常常使一些人逐渐成为慕道友,进而成为基督教徒。

3、通过大办“主日学”布道。大量开办主日学,通过主日学布道是来闽各大基督教差会和福建地方教会推进宣教工作的一大措施。他们不管群众是否愿意皈依基督教,都首先将其大量动员到主日学听讲圣经教义。1920年,被动员去参加福建各地主日学学习的群众达到33,000余人,不仅其数量为该年全国第一,而且还较全国其它省多出两倍<sup>①</sup>;与当年福建全省基督教会学校的学生数相比较,则是其学生数的三倍。美以美会对这一特殊布道方法的应用最为成功,是时所属主日学的学生数多达两万人左右,占全省主日学学生总数的60%。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美以美会(时已改称卫理公会)的信徒数居全省各教派首位且领先许多,与该教派擅长此法布道有直接关系。

4、专门针对特殊人群的布道。特殊人群如人力车夫、搬运工人、残疾人、孤儿和身染恶习者等,他们往往是常规布道中的薄弱环节,福建许多教会组织为此专门制定了针对这些人群的布道方案,采取了特殊的传教措施,有些教会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或指定专人负责。在福州,对人力车夫的传教工作被专列为一项,教会详细了解福州人力车行的数量和人力车夫的人数以及他们的工作、家庭和经济收入情况,然后再根据他们不同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布道。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还特别组织了一个人力车夫等苦力工人的卫生服务队,为他们进行义务诊疗,使他们由此受到

感化。对于残疾人和孤儿,福建不少基督教会、堂会以及西差会都办有诸如指明堂、怜儿堂一类的慈善机构,教会、堂会或传教士一般都会将残疾人和孤儿集中到慈善机构中,组织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对盲人和聋哑人还教其识盲文学哑语,与此同时向他们宣传基督教,讲解圣经,把他们培养成为基督教徒。身染恶习者也是近代福建基督教许多教会、堂会传道工作的重点对象,传道人员对这类人不厌其烦地宣讲基督教的教理教义,耐心规劝,其中有不少人也因此去除恶习改邪归正,加入基督教。

注重在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中开展宣教工作

福建是全国最早在学生中开展传教工作的省份。由于教会学校的学生并非全都是基督教徒,所以早期福建基督教在学生中的传教工作首先是在教会学校中进行的。1885年,在福州英华书院,由传教士中的美国青年会会员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学校青年会,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向教会学校中的非信徒学生宣教,吸收他们成为教会会友。

清末实行学制改革后特别是中华民国建立后,各种公、私立新式学校纷纷建立起来,这些学校的学生成了当时福建基督教差会、教会开展学校宣教工作的主要对象。具体宣教活动以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为主组织开展,青年会中设有专门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和专职干事负责这项工作,差会、教会给予密切的配合。他们在各公立私立学校中组织研经班、宗教哲学研讨会和团契活动等,动员了不少学生参加,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约在1919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当时福州国立学校的学生对基督教已无明显成见,不仅如此,而且在这些学校中已有一些学生开始陆续加入教会,成为信徒。到1920年,福建各类学校中共有基督教青年会21个,会员2,449人。同年,福建各地至少还有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设立的学生分会 17 个，其数目居全国首位。

20 世纪 20 年代“非基运动”后，福建全省范围内的宣教活动暂时转向低潮，学校中的宣教工作也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但到 30 年代，在全国基督教教育协会成立不久，福建也成立了基督教教育协会，重新推动了福建基督教在学校中的传教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州、厦门和广东、江西有多所大学迁到福建内地山区，福建有关地方的教会组织与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相配合，积极进入这些大学宣教并将其推向高潮。这时，在这些大学中团契活动非常活跃，参加者不仅有大学生，而且还有青年教师乃至中老年的讲师教授以及其他员工。教会组织又进一步将宣教活动推向中学甚至小学，许多中学和一些高级小学的团契活动也因而被推动开展起来。1939 年全国基督教学联成立后，福建也相应成立了闽北、闽南两个基督教学生联合会，进一步加强在各类学校中的宣教工作。到抗日战争结束时，闽北和闽南两个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已拥有众多公、私立中等学校的团体会员，如闽北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包括了福建农学院、福建医学院、福建师专等高等学校以及大量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学的基督教青年会。1946 年，厦门基督教团体又推动厦门大学成立了基督教学生公社。

#### 宣教活动远远超出福建一省范围

近代福建基督教的宣教活动不仅在省内大规模开展，而且还远远超出福建，涉及到其它多个省份、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以及国外的许多国家。福建基督教到省外传教最早始于 1867 年，当年福建美以美会福州天安堂派教牧人员 2 人为布道使到江西九江布道。翌年，福建美以美会又派人到北京开辟新的宣教区。1872 年，九江和北京两个宣教区相继建立起来。但由于这两个宣教区远离福建，在管理等方面多有不便，故不久后又先后脱离出去。此

外，1889 年，福建美部会派遣宣教职员多人到江西黎川一带布道。20 世纪 20 年代新教派基督徒聚会处在福建创立后，其领导人为使该教派向全国发展，不断亲自并多次派员到外省传教，足迹遍及大陞（祖国内地）诸多省份，最远及至东北、内蒙和西藏。

台湾在 1885 年建省以前隶属福建。在独立建省前后，台湾始终是福建基督教宣教的一个重点地区。荷兰人在占领台湾时曾向台湾带去基督教，但因台湾人民反抗荷兰人的殖民占领，基督教并未在台传播。基督教在台湾普及是在来闽基督教差会和福建地方教会前往宣教之后。19 世纪 60 年代，在厦门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雅各等即带厦门信徒数人到台湾传教，在厦美国归正教会也派遣传教士去台予以协助。此后，厦门教会多次派出教牧人员赴台扩大宣教，其中包括福建历史上最早的牧师叶汉章以及名牧何希仁等。因为台湾通行闽南话，所以传教士巴克礼还改译厦门方言的“罗马字”圣经在台湾大量印发，成为近代台湾基督教信徒使用的主要圣经版本。19 世纪末，英国长老会和美国归正教会等还联合在闽南组织华人宣道会到金门布道，不久即开辟工作地点 2 处，后来又建立教会学校 2 所。20 世纪初期，真耶稣教传入福建后，该教派的教牧人员以及一些平信徒也以福建为基地积极向台湾传教，终使真耶稣教会成为台湾几乎与长老会齐名的一大教派。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末，基督徒聚会处亦数次派骨干到台传教，建立教会，使之在台湾也迅速发展起来。基督徒聚会处还多次派人到香港布道，该教派的创始人王载甚至亲莅香港主领培灵会，扩大宣教效果。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真耶稣教会和基督徒聚会处还广泛到国外布道，其布道区域以东南亚国家为主，但在亚洲的其它一些国家以及澳洲、美洲和欧洲乃至非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他们也成功地开展了布道工作。